

汉英词典的释义模式对中国 EFL 学习者英语生成能力的影响^{*}

胡文飞¹ 章宜华²

(1. 四川外语学院 英语学院, 重庆 400031;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词典学中心,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 要: 通过控制实验, 本文从用户视角分析了不同的汉英词典释义模式对中国 EFL 学习者英语生成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 不同的释义模式会影响中国 EFL 学习者的英语生成能力; 同等条件下, 汉英学习词典的多维释义模式能更好地满足中国 EFL 学习者的生成需求, 利于提高其词汇生成能力; 中国 EFL 学习者的英语生成能力随释义内容的丰富而渐进发展。本研究的结果不仅证明了学习型汉英词典多维释义的必要性, 还在释义结构和内容上提供了现实依据和操作指南。

关键词: 释义模式; 生成能力; 词汇知识

The Effect of Definition Model in C-E Dictionaries on Chinese EFL Learner's English Productive Ability

HU Wenfei¹ ZHANG Yihua²

(1. College of English Language & Culture,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2. Lexicography Center,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the controlled experiment, the article analyzes, from the user's perspectiv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definition models in C-E dictionaries on Chinese EFL learner's English productive ability.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different definition models will affect the Chinese EFL learner's English productive ability;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the Multidimensional Definition Model (MDM) can meet the demand of user's productive ability in a better way and help improve the lexical competence; Chinese EFL learner's productive vocabulary knowledge will progress gradually with the enrichment of definition components.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y prove the necessity of MDM in new C-E dictionaries and provide reliable proof and practical guide for definition structures and contents.

Key words: definition model; productive ability; vocabulary knowledge

1. 引言

汉英词典是中国英语学习者不可或缺的工具, 而释义构成了词典编纂的核心和灵魂, 因此研究汉英词典的释义模式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此外, 用户研究是词典研究中最新而且最有前途的一个部分, 因此, 要提高汉英词典的编纂质量必须立足于用户分析。

分析汉英词典的释义模式对中国 EFL 学习者英语生成能力的影响不仅利于完善汉英词典的释义模式和结构, 也利于我们了解用户。在研究范式上实现从“以编者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此外, 通过对比分析, 本文不仅能为汉英学习词典“多维释义模式”的构建提供实验支持, 还在释义结构和内容上提供现实依据和操作指南。

* 感谢《外国语》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2. 相关研究回顾

双语词典的多维释义模式认为:释义是对原型交际模式的转换和重构,是不同语言的认知域跨空间的映射和语义整合[14]。因此,对学习型汉英词典而言,其多维释义模式在结构上包括:汉语词目语义框架的多维映射(包括语言图式、知识图式和网络图式);释义过程中交际模式的等值转换(包括原型特征、等值特征和交际特征)。

用户研究是词典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归根结底,一切词典都由查阅者的词汇需求(lexical needs)所驱动”[4:4-5]。然而,传统的用户研究在根本上大都基于理性思辨,因此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表现出不足。首先,把“预设用户”等同于“潜在用户”是不科学的。毕竟,用户是客观独立地存在的,因此编者对“预设用户”的各种推测、假想和模拟都可能偏离“潜在用户”的真实情况。其次,编者自身查阅经验的个体性不能无限递推为用户的群体性。词典学家由于语言能力、直觉和感知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所以他们是最不能代表词典用户的[2:107]。最后,单一的“主观思辨”无法替代多元的研究体系,因此难以实现对用户的全面分析。要真正了解用户对汉英词典释义模式的需求,需要综合“主观思辨”和“控制实验”等研究方法,通过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从用户角度客观反映释义模式对用户语言生成能力的影响。事实上,控制实验也是词典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它与问卷调查和直接观察同为词典学研究的三大研究方法[5]。因此,词典学需要一些实证研究,用定量的方法对用户进行综合描述,如 Coffey [3]和 Herbst [8]的相关研究。

本文将依据词汇知识的分类体系和结构层次来设计实验,通过测试学习者的生成性词汇知识,以此间接描写释义模式对中国 EFL 学习者英语生成能力的影响。Laufer [10]将词汇知识划分为理解型词汇知识(receptive vocabulary knowledge,简称 RVK)、控制型生成性词汇知识(controlled productive vocabulary knowledge,简称 CPVK)和自由型生成性词汇知识(free

productive vocabulary knowledge,简称 FPKV)。Meara [11]分析了 RVK、CPVK 和 FPKV 的非对称性特征,即理解型词汇知识在习得过程中常常先于生成性词汇知识,而 Henriksen [7]则详细描述了各类词汇知识的测试模式。所以本文将延续这种词汇知识的范畴分类,从 FPKV 和 CPVK 两方面研究汉英词典释义模式对中国 EFL 学习者英语生成能力的影响。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和问题

本研究将以心理动词为研究对象,通过控制实验来测试汉英词典的释义模式对中国 EFL 学习者英语生成能力的影响。本文选择心理动词,是因为在词典释义中,“动词通常被看作是释义中难度最大的词汇”[9:141]。心理动词具有抽象意义,是人类释义过程中的难点,因此分析心理动词的释义模式利于研究者以此为基础,归纳描述出所有动词的表征能力和表征效果。

本文的实验对象为广东 XX 大学 2008 级本科学生。一方面,全部受试(98 人)来自 3 个自然班,都是英语专业且具有共同的母语背景,都有 8~9 年的英语学习经历,因此该研究对象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另一方面,全部受试的英语成绩都处于中上等水平(都通过高考和口语考试),并根据高考成绩(高、低分兼顾)被随机编入 3 个平行班,因此其英语水平大致接近。在实验中,有 5 人没有参加生成性词汇知识测试,所以最终进入统计的有效受试为 93 人。

本研究将从实证的角度考察释义模式(在深度和广度上具有显著差异)与中国 EFL 学习者的英语生成能力(控制型和自由型生成能力)的关系。本研究旨在回答下列问题:

1) 同等条件下,不同的释义模式是否会影响中国 EFL 学习者的英语生成能力?

2) 同等条件下,汉英学习词典的多维释义模式是否能更好地满足中国 EFL 学习者的英语生成性需求?

3) 中国 EFL 学习者的控制型和自由型生

成性词汇知识是否随释义模式的变化而呈动态变化? 这种变化有何特征?

3.2 测试工具

本研究的测试工具包括两类: 基础英语测试题(用于英语水平测试)和释义效果测试题(测试释义模式与学习者生成能力的关系)。

1) 基础英语测试题

基础英语测试题包括主观题和客观题, 该题的制作是参考同类院校试题结构并综合多名教师集体智慧而成, 因此信度和效度都较高。

2) 释义效果测试题

释义效果测试题包括单项选择和自由造句。在本研究中, 我们将根据语义、类别、句法、功能等特征, 通过分层抽样从 8 本^①主流的汉英词典中选择其共有的 10 个心理动词^②构成题干和释义对象。分层抽样既有代表性又有针对性, 所以非常实用。此外, 为了防止学生在句子生成过程中受原有词汇知识的干扰, 所提供的英文对等词都采用“造词法”进行改编(将对等词开始两个字母和最后两个字母合成新词, 如 suspect 则改写为 suct), 使其以“生词”的形式出现。同时, 为了防止学生对相邻相近的词产生联想, 进而影响查阅质量, 我们对部分改写后的词进行了再组合、再改造(如将 guess 改写为 guss, 再改编为 guee), 以确保对等词对所有受试都是陌生的, 并在结构上接近英语单词。这样能使控制变量(中国 EFL 学习者的原有词汇知识)中立化, 从而减少对自变量(释义模式)和因变量(中国 EFL 学习者生成能力)的影响。

单项选择(共 5 题)。单项选择主要用于测试中国 EFL 学习者的控制型生成性词汇知识, 它要求测试者根据句子中文意义, 从 4 个被选项中选出最适合的释义。每题选择正确 2 分。对于 3 组同一英语水平的测试者, 所提供的选择题的题干相同, 但备选项(释义模式)在广度和深度上具有典型差异。实验 1 班、2 班所提供的释义模式(包括对等词和例句)全来自实验中的 8 部汉英词典^③, 并按照释义内容和层次划分为两类(1 班只提供对等词, 2 班提供对等词和例证)。而实验 3 班的释义模式

(见例 1)立足于“汉英学习词典的多维释义模式”, 在广度上包括了词类标注、句法标注、语用标注、对应表达、例证说明、同义辨析等, 在深度上强化释义的原型特征、等值特征和交际特征。

例 1. We ____ he stole my car. (我们[猜]是他偷了我的汽车)

猜: Sb^④ + spte prep/guee + Sth; Sb + suct/imne + Sth/that

A: <Vt> spte on/about/that 他猜近期可能会下雨。He sptes that it will rain these days.

B: <Vt> suct n/that/sb of sth 我猜他和这件事情有点牵连。I suct that he is more or less involved in it.

C: <V> guee (n/that) 这小孩猜着了一个谜语。The kid gueeed a riddle.

D: <Vt> imne n/that 我猜不出她的意图。I can't imne what she means.

辨析: spte 推测, 苦思冥想, 有怀疑因素但证据不足。suct 怀疑, 对某事情倾向于相信, 认为“很有可能”。guee 推测, 凭想象估计。imne 猜想, 随意进行无拘束的形象化过程。

自由造句(共 5 题)。自由造句主要用于测试中国 EFL 学习者的自由型生成性词汇知识, 它要求学生从所提供的 4 个英文对等词中选择一个进行造句。对于三组同一水平的测试者, 相同的题干, 不同结构的释义模式(与单项

① 《汉英词典》、《现代汉英词典》、《新时代汉英大词典》、《汉英辞典》新世纪版、《实用汉英翻译词典》、《新汉英辞典》、《新世纪汉英大词典》和《汉英大词典》。

② 这些心理动词包括“沉迷、猜、楞、相信、琢磨、恨、陶醉、哀悼、疼和嫌恶”。

③ 为了更好地控制测试对象(以确保他们在测试过程中都参阅了词条内容), 并利于数据统计, 本研究将对等词和例证用 A、B、C、D 的形式进行编排(如例(1)), 所以在表面上与现实的词典词条略有差异, 但内容与真实的词典完全一致。

④ 在汉英学习词典多维释义过程中, 编者将句法模式和搭配结构融为一体, 这样表述更清晰、结构更完整。此外, 由于心理动词在句法上涉及 EO(感受者做宾语)和 ES(感受者做主语)的转换, 因此在句法标注时也需要明确论元结构(如 Sb, Sth, N 等)。

选择类似 1 班只提供对等词 2 班提供对等词和例证)。实验 3 班的释义模式(见例 2)则立足于“汉英学习词典的多维释义模式”。评分标准为:满分 2 分 动词语法正确 1 分(如词类、搭配) 动词语义正确 1 分(如语用、语体是否恰当)。同时,为了评分的客观、公正,将综合两名评分人的结果,取平均分。

例 2. 恨 _____

恨: Sb + haee/reet/rnet + Sth; Sb + V + Prep + haed/reet

A: < V > haee n/to do 他恨这些嘲笑他的人。
He haeeed those people who laughed at him.

B: < Vt > reet n/that 恨此事爱莫能助。I reet that I can't help.

< N > adj reet 老人带着遗恨离开了这个世界。
The old man died with eternal reet.

C: < N > adj/prep haed 她恨得咬牙切齿。She ground her teeth with haed.

D: < Vt > rnet n/doing 他恨被别人干涉。He rneted being interfered with by others.

3.3 测试过程

本研究包括前期测试和规模测试。前期测试主要检验学生的英语水平,我们在同一时间用相同的试题(基础英语考题)对 3 个自然班的学生进行英语水平测试,以验证所有测试小组是否处于同一英语水平。在规模测试中,我们将为测试者提供相同的试题(包括选择题和自由造句)和不同的心理动词释义模式。所有受试在同一时间接受测试,并在 20 分钟内完成实验。所有数据将通过 SPSS 15.0 进行组间单因素方差分析,以验证其差异性和显著性。

在统计内容上,我们将主要通过描述性统计、方差齐性检验(Test of Homogeneity of Variance)和组间单因素方差分析(One Way ANOVA)进行组间差异比较。在以上 3 项内容中,方差齐性检验是组间单因素方差分析的必备前提,因为进行方差分析需假定各组数据的

方差整齐。

3.3.1 英语水平的组间差异对比

在测试中,为了确保 3 个测试组在整体上处于同一英语水平,我们将再次对 3 个实验班^⑤进行英语水平组间差异对比,因为只有确保实验组(3 班)和对照组(1、2 班)处于同一水平,我们才能对实验进行深入研究。

由于所有受试均来自总体呈正态分布的中国英语专业学习者,且各组之间的方差具有同质特征(方差齐性检验的结果显示 $p > .05$),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组间单因素方差分析来检验各测试组在英语水平方面的差异性。在本实验中,我们对 3 个组进行零假设,即假定各组之间的英语水平无差异。

下页表 1 表明,对 3 个组进行英语水平组间单因素方差分析时, $F(1, 179) = 1.190$, $p > .05$, 因此接受零假设,即 3 个组的英语水平在 .05 的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

3.3.2 英语生成能力的组间对比

积极性词汇知识的分类体系表明,要实现特定用户英语生成能力的描述必须立足于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取向。所以,在对各组受试进行英语生成能力对比时,本研究拟从静态描写和动态对比两方面进行分析。静态描写主要立足于受试整体输出水平、控制型生成性词汇知识和自由型生成性词汇知识等三方面进行组间差异比较。在动态对比中,我们将系统阐释 3 个组在生成性词汇知识方面的发展规律,以此全面地描写其发展模式。

1) 生成性词汇知识的整体分析

a) 描述性统计

统计结果表明,各受试组的生成性词汇知识表现出两大特征:首先,就均值(Mean)而言,在 1、2、3 组之间,英语生成能力的均值呈现逐级上升的趋势,实验 3 组的成绩(17.032 3)远远高于对照 2 组(12.687 5)和 1 组(7.783 3)。

^⑤ 本文的实验对象为 3 个自然班(他们构成实验中的 3 个组),实验目的是为了进行“组间差异比较”,所以为了符合统计术语并规范文字表述,我们会交替使用“3 个班”和“3 个组”,但两者所指内容一致。

表 1 英语水平的组间单因素方差分析表

ANOVA

Score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Between Groups	(Combined)		184.074	2	92.037	1.190	.309
	Linear Term	Unweighted	1.314	1	1.314	.017	.897
		Weighted	1.033	1	1.033	.013	.908
		Deviation	183.042	1	183.042	2.367	.127
Within Groups			6959.539	90	77.328		
Total			7143.613	92			

表 2 控制型生成性词汇知识的描述统计表^⑥

Descriptives

Score

	N	Mean	Std.Deviation	Std.Error	95%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Mean		Minimum	Maximum
					Lower Bound	Upper Bound		
1.00	30	4.6000	1.49943	.27376	4.0401	5.1599	2.00	6.00
2.00	32	7.1250	1.60141	.28309	6.5476	7.7024	4.00	10.00
3.00	31	8.9032	1.53525	.27574	8.3401	9.4664	6.00	10.00
Total	93	6.9032	2.33156	.24177	6.4230	7.3834	2.00	10.00

其次,各组之间的标准差(Std. Deviation)在总体上差异较小(分别为 2.032 85、2.770 09 和 2.810 50),由此可见其离散度也非常接近,都比较低。

b) 组间单因素方差分析

3 个组整体成绩之间的同质性显著值(方差齐性检验的结果显示 $p > .05$)表明各实验组的方差在 .05 的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即各组的方差是同质的、整齐的。因此,在各组间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是科学的,也是合理的。在本实验中,我们将对 3 个组进行零假设(假定 3 个组的英语总体生成能力无显著差异)。通过对各实验组的英语生成能力进行组间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F(2, 90) = 98.753$, $p < .05$, 因此否定零假设,即 3 个组的英语整体生成能力在 .05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差异。结合描述性

统计的相关数据,表明实验组(基于多维释义模式)的成绩远高于控制组(基于传统释义模式),且差异非常显著。

2) 控制型生成性词汇知识的组间差异对比

a) 描述性统计

受试各项统计数据(见表 2)表明,各组的控制型生成性词汇知识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就均值而言,在 1、2、3 组之间,英语生成能力的均值呈逐级上升的趋势,实验组(3 组)的成绩(8.903 2)高于 2 组(7.125 0)和 1 组(4.600 0)。在总分只有 10 分的前提下,这种组间的均值差异性已经比较明显。其次,各组之间的标准差在总体上差异较小(分别为 1.499 43、1.601 41 和 1.535 25),由此可见其离散度非常接近,总体数据基本呈正态分布。

b) 组间单因素方差分析

^⑥ 表 2 中的“1.00、2.00、3.00 和 Total”分别表示“受试 1 组、受试 2 组、受试 3 组和所有受试组”,表 3 也一样。

组间单因素方差分析的前提是各测试组的数据具有同质性。在控制型生成性词汇知识方面 3 个组成绩之间的同质性显著值(方差齐性检验的结果显示 $p > .05$) 表明各组的方差在 .05 的水平上是同质的、整齐的, 可以进行组间差异对比。在组间单因素方差分析中, 我们首先进行零假设, 假定 3 个组在控制型生成性词汇知识方面无显著差异。实验组和控制组的组间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 $F(2, 90) = 59.479$, $p < .05$, 因此否定零假设, 即 3 组受试的控制型生成性词汇能力在 .05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差异。结合其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我们可以初步断定, 实验组(基于多维释义模式)的成

绩远高于控制组(基于传统释义模式), 且差异非常显著。

3) 自由型生成性词汇知识的组间差异对比

a) 描述性统计

受试各项统计数据(见表 3) 表明, 各实验组的自由型生成性词汇知识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 就均值而言, 在 1、2、3 组之间, 英语生成能力的均值逐级上升, 实验组(3 组)的成绩(8.129 0) 远远高于对照 2 组(5.562 5) 和对照 1 组(3.183 3)。由于总分只有 10 分, 可见这种差异性非常显著。其次, 各组之间的标准差在总体上差异较小, 可见其离散度非常接近, 基本呈正态分布。

表 3 自由型生成性词汇知识的描述统计表

Descriptives								
Score								
	N	Mean	Std.Deviation	Std.Error	95%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Mean		Minimum	Maximum
					Lower Bound	Upper Bound		
1.00	30	3.1833	1.45320	.26532	2.6407	3.7260	.00	6.00
2.00	32	5.5625	1.87406	.33129	4.8868	6.2382	.00	9.00
3.00	31	8.1290	1.56508	.28110	7.5550	8.7031	3.00	10.00
Total	93	5.6505	2.58947	.26852	5.1172	6.1838	.00	10.00

b) 组间单因素方差分析

在自由型生成性词汇知识方面 3 组成绩之间的同质性显著值($p > .05$) 表明各实验组的方差在 .05 的水平上是同质的、整齐的, 因此可以进行组间单因素方差分析。在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时, 我们首先进行零假设, 即假定实验组(3 组) 和对照组(1、2 组) 之间在自由型生成性词汇知识方面无显著差异。组间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统计结果显示 $F(2, 90) = 69.958$, $p < .05$, 因此否定零假设, 也就是说 3 个组的自由型生成性词汇知识在 .05 的水平上差异显著。结合其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 我们可以断言, 实验组在自由型生成性词汇知识方面的输出能力远远高于控制组, 且差异显著。

4) 控制型与自由型生成性词汇知识的动态对比

图 1 表明, 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控制型与自由型生成性词汇知识的均值表现出以下特征:

a) 在所有 3 个组中, 控制型生成性词汇知识的均值总是高于自由型生成性词汇知识。如图 1 所示, 控制型生成性词汇知识的均值分别为 4.6、7.12 和 8.9, 高于同等条件下自由型生成性词汇知识的 3.18、5.16 和 8.13。

b) 从 1 组到 2、3 组, 控制型和自由型生成性词汇知识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虽然上升幅度略有差异。图 1 显示, 在控制型生成性词汇知识中, 从 1 组到 2 组的增幅(约 2.52) 远远高于从 2 组到 3 组的增幅(约为 1.78)。而在自由型生成性词汇知识方面, 从 1 组到 2 组的增幅

(约 1.98) 远低于从实验 2 组到 3 组的增幅 (2.97)。总体而言,从 1 到 3 组,自由型生成性词汇知识的增幅(4.95) 远大于控制型生成性词汇知识的增幅(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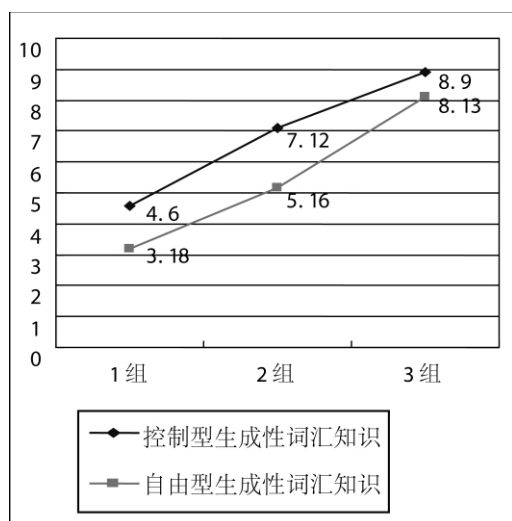


图 1 控制型与自由型生成性词汇知识的均值对比

4. 结果与讨论

以上实证研究表明:不同的汉英词典释义模式影响中国 EFL 学习者的英语生成能力;汉英学习词典的多维释义模式能更好地满足中国 EFL 学习者的输出需求,利于提高其词汇生成能力;中国 EFL 学习者的英语生成能力随释义内容的丰富而渐进发展。

4.1 不同的汉英词典释义模式影响中国 EFL 学习者的英语生成能力

统计结果(见表 2、3)表明,基于不同释义模式的 3 组受试所反映出的英语生成能力差异很大,且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意义($p < .05$)。出现这种结果,原因可能是:

1) 不同释义模式的信息表征内容差异很大。在信息表征内容方面,汉英词典的传统释义模式和多维释义模式差异很大,而这种差异性导致了中国 EFL 学习者的英语生成能力的差异性。传统释义模式在表征内容上多局限于提供“对等词”和有限的例证,表现出很强的单

一性。单一、离散的释义成分难以构建完整的语言图式、知识图式和网络图式,因此不利于中国 EFL 学习者生成正确的句子。多维释义模式认为释义是不同语言的认知域跨空间的映射和语义整合,因此强调释义组构成分的系统性和关联性[14]。此外,通过完整的框架映射,汉英词典的多维释义实现了对语词语义结构的完型表征,并有效增加了用户的可理解性输入,因此利于提高二语的生成能力。

2) 不同释义模式的认知可及性差异很大。实体表征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主要表现为其在记忆系统中的激活状态[1]。可及性越强,其认知阈限(threshold)越低,则在记忆中更容易被激活启动。在汉英词典的释义中,这种认知可及性外在地表现为表征过程中对“用户认知特征和信息加工能力”的关注。传统释义模式以编者为中心,其“用户研究”多以主观预设为主,因此释义模式体现的是编者的意志,对释义结构的认知可及性关注较少。

多维释义模式以“词典用户”为中心,强调意义表征组构成分的认知可及性。一方面,无论是标记性注释还是补充说明,都是释义过程中对特定语义结构形式的突显。突显能延续实体在大脑中的记忆,并提高主体对次结构乃至整个认知场景的了解,因此利于记忆加工。此外,对语词语义结构的完型表征能从信息加工的角度增强表征实体的认知可及性,利于用户的长久记忆。事实上,强化意义表征体的完整性和关联性能增强信息表征体的宽度和深度,并与心理词库形成了多处交汇,以此延伸信息接触面,进而形成多层面的信息启动节点。而信息启动节点的扩延有助于用户形成更丰富的语义网络体系,利于提高记忆质量和储存效果。另一方面,汉英学习词典的多维释义模式通过标注体系(包括词类、语用等)和补充说明(如同义辨析、用法提示)等方式来完善语义表征结构。“标注”的简洁性和“补充说明”的系统性完善了语义表征系统,并通过对比分析,从输入角度有效地增强了表征体的可及性,利于强化用户的深度习得效果。

4.2 汉英学习词典的多维释义模式利于提高中国 EFL 学习者的英语生成能力

表 2、3 的数据显示,汉英学习词典的多维释义模式利于提高中国 EFL 学习者的英语生成能力,原因可能在于:

1) 汉英学习词典的多维释义模式符合词汇组织的系统性表征需求。语言是系统的,因此,作为语言底座的词汇,其系统性是自明的。而这种系统性客观上要求对词义进行多维表征,因为双语词典(包括汉英词典)应该具备满足词典使用者旨在培养系统词汇能力的认知需求。汉英学习词典的多维释义模式强调对源语词的系统表征,将释义看作是对各图式结构(包括语言图式、知识图式和网络图式)的多维映射和对交际模式的等值转换,因此从根本上顺应了词汇组织的系统性表征需求[14]。另一方面,多维表征也顺应了词汇的网络特征。词汇的网络特征要求词典的语义表征必须围绕其系统意义(sense)和外指意义(reference),以系统的形式实现对特定语词的全息表征。

2) 汉英学习词典的多维释义模式符合词典表征的功能性需求。词典功能观认为,词典所提供的信息主要用于增强用户的认知功能(cognitive function,即增加用户的语言知识)和交际功能(communicative function,即解决交际问题)[13:132]。汉英学习词典的多维释义模式在本质上更能满足这种多元的功能性需求。一方面,汉英学习词典的多维释义模式描写了对应词的形态结构、词类标注等,这种基于静态语言知识的描写能增强用户对对应词认知功能的了解。另一方面,汉英学习词典的多维释义模式还完善了句法结构、语用结构、系统关系等极具启发、推演本质的表征系统,这种对隐性、动态知识的探悉能增强用户对词汇的驾驭能力,进而提高其交际能力和使用得体性。

4.3 中国 EFL 学习者的英语生成能力随释义内容的丰富而渐进发展

对比两种生成性词汇知识在 3 组受试中的发展模式,我们发现随着汉英词典表征内容的丰富,中国 EFL 学习者的英语生成能力表现出

渐进特征。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相对于传统的单一释义结构,多维释义以“完型”表征模式全面突显了对应词汇的认知和交际语境。事实上,从实验 1 组到 2 组、3 组,各释义表征成分不断增强,认知语境和交际语境的补充和完善使各表征体逐步整合为完型的表征结构体。多维释义在本质上是这种完型表征结构的客观再现,其形态结构、语义结构、语用结构等组构成分直接构建成完型的意义表征系统,而对概念框架的描述则是通过隐性、背景化模式,以此间接映射对应词汇的交际语境。

其次,多维释义以“相融性”结构模式再现了对应词汇的系统网络结构。词汇“相融性”(lexical compatibility)主要通过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揭示了词汇的系统结构[12]。从实验 1 组到 2 组、3 组,各释义组构成分的相融性呈渐进发展趋势,这使受试的英语生成能力也随之渐进发展。在汉英词典中,多维释义模式将这种词汇相融性具体为聚合中的句法结构归类、同义词汇辨析以及组合关系中的搭配模式等。通过对这种暗含组合、聚合规则的词汇相融性特征的描写,编者能更好地再现对等词的系统网络结构,因此利于提高用户的英语生成能力。

5. 结语

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用户群体(中国 EFL 学习者),从实证的角度对不同的释义模式(在深度和广度上具有显著差异)与中国 EFL 学习者的英语生成能力(控制型生成能力和自由型生成能力)的关系进行研究,该研究的结果对汉英词典的编纂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一方面,新型的汉英学习词典应以多维释义模式代替传统的单一释义模式,因为前者利于提高用户的控制型和自由型生成性词汇知识,因此利于提高用户的英语生成能力。另一方面,用户的词汇生成能力随着表征模式的丰富而迅速提高,因此在构建和完善汉英词典的多维释义过程中,编者应着力于丰富目的语词

的表征模式(完善目的语词的语言图式、知识图式和网络图式结构),从根本上实现对源语词汇的完型表征。

参考文献:

- [1] Ariel, M. Referring and accessibility [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88, (24): 65-87.
- [2] Béjoint, H. *Modern Lexicography: An Introduc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 [3] Coffey, S. Review of P. Procter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6, (3): 383-387.
- [4] Hartmann, R. R. K. *Lexicograph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C].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3.
- [5] Hartmann, R. R. K. Four perspectives of dictionary use: a critical review of research methods [A]. Cowie, A. P. *The Dictionary and the Language Learner: Papers from the EURALEX Seminar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C].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87.
- [6] Hartmann, R. R. K. *Lexicography: Critical Concept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7] Henriksen, B. Three dimensions of vocabulary development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99, (21): 303-320.
- [8] Herbst, T. On the way to the perfect learner's dictionary: a first comparison of OALD5, LDOCE3, COBUILD2 and CID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 1996, (4): 321-357.
- [9] Landau, S. I. *Dictionaries: The Art and Craft of Lexicograph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0] Laufer, B. The development of passive and active vocabulary in a second language: same or different?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8, (19): 255-271.
- [11] Meara, P. *The Dimensions of Lexical Competen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2] Piotrowski, T. The meaning-text model of language and practical lexicography [A]. Tomaszczuk, Jerzy & Barbara Lewandowska-Tomaszczyk. *Meaning and Lexicography*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277-286.
- [13] Tarp, S. *Lexicography in the Borderland Between Knowledge and Non-Knowledge* [M].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2008.
- [14] 章宜华, 雍和明. 当代词典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外汉语学习词典词类标注实证研究”(08XYY009)、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二语习得理论与新一代英汉学习词典理论框架的研究”(09YJA740027)和重庆市教委科研项目“内向型汉英学习词典多维释义模式的构建”(11SKJ11)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0-11-30

作者简介: 胡文飞(1974-),男,四川眉山人,副教授,博士,硕导。研究方向:语义学、词典学。

章宜华(1956-),男,湖北襄樊人,教授,博士,博导。研究方向:词典学。

